

[illegible]

都有所謂雅俗之分……



中国经济出版社

89029

G122
3
415



200176692

雅俗文化書系

俗文化

牛爱忠 方国根 编著

DI63/02



中国经济出版社

(京)新登字 079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俗文化/牛爱忠,方国根编著.-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3

(雅俗文化书系/严平主编)

ISBN 7-5017-3240-X

I. 俗… II. ①牛… ②方… III. 死亡-文化-专题研究-中国 IV. G1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00268 号

责任编辑:王燕群 (8353180)

装帧设计:曹 春

图片摄影:刘建初

俗 文 化

牛爱忠 方国根 编著

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发行

(100037·北京市百万庄北街3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雍和图书文化服务中心激光照排

京安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1/32 5.375 印张 110 千字

1995 年 3 月第 1 版 199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01—5000

ISBN 7-5017-3240-X/2·452 定价:6.8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题 字：赵朴初

名誉顾问：季羨林

主 编：严 平

主 审：韩天雨

编 委：王燕群 王岳川 朱正琳

欧阳胜 韩忠本 高 毅

何 云 唐师曾 袁 满

黄盛华 张 方 邓安庆

魏 民

总 序

在中国，在文学艺术，包括音乐、绘画、书法、舞蹈、歌唱等等方面，甚至在衣、食、住、行，园林布置，居室装修，言谈举止，应对进退等方面，都无所谓雅俗之分。

什么叫“雅”？什么叫“俗”？大家一听就明白，但可惜的是，一问就糊涂。用简明扼要的语句，来说明二者间的差别，还真不容易。我想借用当今国际上流行的模糊学的概念说，雅俗之间的界限是十分模糊的，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决非楚河汉界，畛域分明。

说雅说俗，好像隐含着一种评价。雅，好像是高一等的，所谓“阳春白雪”者就是。俗，好像是低一等的，所谓“下里巴人”者就是。然而高一等的“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十人”，而低一等的“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究竟是谁高谁低呢？评价用什么来做标准呢？

目前，我国的文学界和艺术界正在起劲地张扬严肃文学和严肃音乐与歌唱，而对它们的对立面俗文学和流行音乐与歌唱则不免有点贬意。这种努力是未可厚非的，是有其意义

的。俗文学和流行的音乐与歌唱中确实有一些内容不健康的东西。但是其中也确实有一些能对读者和听众提供美的享受的东西，不能一笔抹煞，一棍子打死。

我个人认为，不管是严肃的文学和音乐歌唱，还是俗文学和流行音乐与歌唱，所谓雅与俗都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其目的只能是：能在美的享受中，在潜移默化中，提高人们的精神境界，净化人们的心灵，健全人们的心理素质，促使人们向前看，向上看，向未来看，让人们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人类，愿意为实现人类的大同之域的理想而尽上自己的力量。

我想，我们这一套书系的目的就是这样，故乐而为之序。

李 孟 林

1994年6月22日

目 录

序：俗文化——孕育雅文化的母体	(1)
一、俗文化史话	(7)
1. 俗文化的由来	(7)
2. 俗文化的历史演变	(12)
3. 从俗到雅与由雅入俗	(23)
二、习俗管窥	(26)
1. 巫术信仰习俗	(29)
2. 岁时节日习俗	(45)
3. 人生礼仪习俗	(57)
三、俗人·俗事·俗书	(74)
1. 俗人	(74)
2. 俗事	(87)
3. 俗书	(99)
四、俗语·掌故趣谈	(110)
1. 俗语·掌故漫议	(111)
2. 俗语·掌故拾零	(118)
五、都市文化一瞥	(139)
1. 社会“转型”与文化迁衍	(139)
2. 现实——世俗化的文化时尚	(141)
3. 当代都市文化的几个主要特征	(145)
4. 都市文化中的流行现象	(150)

5. “新京味文化”、“海派文化”与“岭南文化”

..... (152)

结语：文化理性——俗文化的升华 (156)

参考文献

序：俗文化——孕育雅文化的母体

中国，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有悠久的历史，有灿烂的文化。中国文化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既是各族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又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

在这一文化领域，盛开着两朵艳丽的奇葩：雅文化与俗文化。无论称为精英文化与市民文化，还是叫作通俗文化与高雅文化，其根本区别在于“雅”与“俗”两个字上。雅者，高雅，严肃也；俗者，大众的，通俗的意思。当我们试图对雅文化与俗文化作一泾渭分明的界定时，会突然发现遇到了一个解不清的难题。二者的界限似流水，抽刀不断；如思绪，剪不断，理还乱。面对浩如烟海的中国文化典籍，恍如闯进一座富丽堂皇的皇家园林：绿草茵茵，鲜花灿灿，佳树葱郁，溪水潺潺，令我们目不暇接。它们是如此的辉煌，如此的伟大，我们根本无意于分出何雅何俗，只是觉得卢梅坡的《咏梅》诗用在这里是再恰当不过了：“有梅无雪不精神，有雪无诗俗了人，日暮诗成天又雪，与梅并作十分春。”它们各具千秋，缺一不可，共同构筑成中华民族的文化大厦。

然而，文化确乎有雅俗之分。历代统治者、封建士大夫对雅与俗划定了严格的界限，他们推崇雅文化，贬损俗文化，

并利用手中的权力极力压制甚至迫害俗文化；但是，俗文化在人民大众之中有着深厚的产生与发展的沃土，深受人民大众的喜爱，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因此，从春秋末期的“先王之乐”与“郑卫之音”的争论，一直到清王朝的“花雅之争”，一以贯之的便是雅俗之争。

根据郑玄的《〈周礼〉注》：“雅，正也，古今之正者，以为后世法。”雅正、雅淡，意味着士大夫的政治态度、处世哲学和人生修养；雅致、雅兴、雅怀等标志着文人生活的特色；而雅更成为儒家审美准则之一，士大夫的一切文化均标以“雅”字。平民百姓对文化则持一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他们仅知道文化、娱乐、信仰与生命息息相关，能够抒发情怀，解除困顿。他们或歌或舞，出自天然；或祈祷，或膜拜，发自心灵。虽然它们原始、粗糙，甚至怪异、荒诞，但它古朴、直率，较少伪善，直抒胸臆，自成体系，形成所谓的俗文化。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雅俗之争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其中最突出的是文艺史上的雅俗之争，这对矛盾的主要表现是民间文艺同宫廷文艺的对立。当郑卫之地的“新声”盛起时，便爆发了历史上第一次雅俗之争。当时作为官方统治阶级的礼乐是“先王之声”，包括黄帝的《云门》，尧的《大咸》，舜的《大韶》，禹的《大夏》，汤的《大夔》，周初的《大武》等，统称为六代舞。此外还包括西周和春秋初期的祭祀之乐，即《大雅》和《颂》。以上统属“雅乐”，流行于宫廷和上层社会；“郑卫之声”是春秋时期郑、卫地区的民歌，是当时各国民歌的代表，属于名符其实的俗文艺。从内容上讲，“先王之乐”维护奴隶主阶级的政治、伦理思想，“郑卫之声”则对此采取抵制态度，于是冲突便不可避免，以至于

孔子在齐国听了演奏《韶》乐后，竟如痴如醉，三月不知肉味；对“郑卫之音”却疾恶如仇，要“放郑声，远佞人。”从此，褒雅贬俗成了儒家和历代帝王的基调，进而甚至对俗乐进行歧视、压制、甚至严禁，这一政策一直沿续到明清。文人雅士、士大夫阶层对俗文化的鄙视、污蔑和压迫也一直漫衍下来，使得重雅轻俗的传统偏见渗透进各个领域，影响了整个民族。如在绘画领域这种分歧也极为明显，一般说来，描画现实生活和眼前事物，首先要求形似，艺术形象同客观事物之间几乎没有差别，而作品是否寓有画家的思想感情则是次要的。这种题材及描绘方法，文人画家嗤之以鼻，艺术批评家也认为俗不可耐。因此，宋人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描绘了北宋首都汴河两岸人民生活场景，既为人们交口称赞，又具有历史参考价值，但明人张丑却认为：“所画皆舟车城廓桥梁市廛之景，亦宋之寻常品，无高古气也。”归为俗一类，不登大雅之堂。直至现代，褒雅贬俗的观念仍盘据在一些文人学者脑中，他们自视为无冕之王，坐于象牙塔内，以雅自居，鄙视俗人，而将俗文化搁置一旁少加理会。俗文化的命运犹如后妈的孩子被赶出大雅之堂，流浪于民间，混迹于酒肆街巷。

但是，俗文化由于植根于民间，为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因而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尽管封建统治者有时将它视为毒蛇猛兽，横加摧残，俗文化仍象野草一样，“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俗文化以其勃勃生机，昂然挺立于中国文化的百花园中，同雅文化一起，构筑了灿烂辉煌的文化大厦。

文化的发展自有其遵循的客观规律，统治阶级、文人雅士概莫能外。雅文化不仅同俗文化相依相存，相互包含，而

且雅文化如果不从俗文化中汲取营养，滋润自身，便无从产生，更不能成长。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俗文化是一切雅文化的孕育之母，无论是经学、史学，还是神学、文学。

雅文学是吸取俗文学的乳汁长大的，这是显而易见的。这种乳养亲缘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雅文学中的不少精品源起于古代的民歌民谣，经雅人的收集、删订、编纂升格而成，如《诗经》、《楚辞》等；其二，雅文学的不少文体如近体诗、宋词等莫不萌生于民间；其三，文人雅士无不从广大人民群众中间汲取生活内容、语言内容，文化史中不时也有俗文学的作家写出影响广远的传世之作，雅文学便招为同类。雅文学之所以不断取得令千秋万代称誉的辉煌，“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俗文学便是其“源头活水”。

被历代统治者视为经典的《诗经》、《周易》概莫能外。《诗经》中的“国风”无疑就是民歌，没有劳动人民创造的内容广泛的民歌，也不会有士大夫的雅，统治集团的颂。《周易》这部六经之首也起源于千百万原始先民的宗教实践，他们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以卜筮预测吉凶泰否，为《易》的创立奠定了基础。

土生土长的中国道教是宗教来源于俗的典型代表，它滥觞于战国时代的原始道教。当时巫术、淫祀、神仙方术、五行相生相克以及讖纬说等在民间广为流行。汉末，张道陵于鹤鸣山创五斗米道，张角于北方创太平道。此后二百年，经知识精英的改造和重建，大批门阀士族的崇信，逐渐使道教走向上层社会，至唐宋年间，真正发挥了正统宗教的作用，彻底完成了道教雅化的过程。

通过“词”这一盛极一时、经久不衰的文学形式的演变，

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更为清晰的印象。词源起于市井歌谣，早在唐代，随着“胡夷里巷之曲”的播入，音乐世界繁荣起来，民间艺人为配合乐调节奏的抑扬亢坠，“倚声填词”，填入长短句参差的歌词，词遂应运而生。词诞生于民间，其初期题材也以表现市井情态为主，语言也颇率直俚俗，如“枕前发下千般愿，要休且待青山烂，水面上秤锤浮，直待黄河彻底枯。白日参辰现，北斗回南面。休即未能休，且待三更见日头。”几乎全是平铺直叙的白话。至晚唐，文人开始正式介入词的创作，温庭筠在创立的文人词中，胡夷里巷、市井歌谣，均已入词。他的词以表现“坊曲情怀”为主，状绘坊曲女性的伤离怨别；同时在语言上变民间俚俗的词风为含蓄蕴藉，把情语化景语。如《忆江南》：“梳洗罢，独倚望江楼，过尽千帆皆不是，斜晖脉脉水悠悠，肠断白蘋州。”内容并未脱俗，语言却得到了升华。柳永以其经常出没于秦楼楚馆及坊曲的生活经历，推出了文人俗词这一格式：创作主体为文人，创作内容多为秦楼楚馆的男欢女爱，创作手法上大量运用民间流行的长调，采取平铺直叙，语言上也弃雅从俗。因此，一时间“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形成“天下咏柳词”的局面。如他的《蝶恋花》：“独倚危楼，风细细，望极离愁，黯黯生天际。草色山光残照里，无人会得凭栏意。也拟踈狂图一醉，对酒当歌，强乐还无味。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词发展至婉约派又发生了变化，一方面继承了柳永的文人俗词，另一方面以俗为鄙，因此以自觉的文人意识与文人情怀对柳词加以“雅化”；其次，对于艳情的描写越来越归于雅正，渗透进士大夫文人的情趣。如苏轼的词：“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

仗听江声。常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毅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声。”便渗透了一种无所寄托的空灵感。由苏轼、周邦彦开展的雅化工作，经过南宋的发展，使词更向典雅精致方向发展，终于完成了词的雅化过程。

结论是显明的：高雅文化由昔日的通俗文化发展而来，每种通俗文化都有发展为高雅文化的可能性。而一种文化要在文化史上留下印迹，必定要经历从通俗到高雅，从原生态到定型、精致化的过程。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俗文化是孕育雅文化的母体。

“梅需逊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段香”，让我们以各有千秋的姿态欣赏、享用雅文化与俗文化这两支并开不衰的奇葩，荡游于中国文化的百花园中陶醉一番。等你心满意足迈出这座花园后，你会突然发现：你的灵魂得到净化，你的心境得到了一次升华。

一、俗文化史话

半亩方塘一鉴开，
天光云影共徘徊。
问渠那得清如许？
为有源头活水来。

1. 俗文化的由来

(1) 俗文化生长的社会土壤

“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俗文化作为一种社会意识也不外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在中国俗文化产生的土壤中，至少有几个因素是不容忽视的，即：半封闭的地理环境，农业型自然经济，家国一体的宗法社会以及受诸多因素影响形成的中国人的民族性格。

半封闭的地理环境 中国东濒茫茫沧海，西北横亘漫漫戈壁，西南耸立世界屋脊青藏高原。外部交通极为不便，而内部回旋余地又相当开阔，造成一种与外部世界相对隔绝的状态，这对中国文化的形成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中国文化始终保持着自身的风格，以一个独立的古文化系统得以完

整的延续下来。

由于中国文化的这一特征，加之古代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知之甚少，中国人在相当长时间内把黄河、长江领域视为“域内”，而把其他地区看作“方外”，“化外”。由于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中国人视这方乐土为“中国”，“中国者，天下之中也”，中国人由此也长期形成了一种颇富尊严感的“自我意识”，自视为“天朝上国”，而将外国目为“四夷”，从而铸造了中国人独具风格的文化特征，中国俗文化的各个领域，各种内容无不打上这一明显的印痕。

农业型自然经济 中国先民聚居在黄河长江滋润的一片肥沃的土地上，为农业生产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中国先民的主体早在大约六千年前后，就逐渐超越狩猎和采集经济阶段，进入以种植经济为基本方式的农业社会。“禹，稷躬稼而有天下”，便是农业发展的结果。中国历来“以农立国”著称，历代帝王都有耕籍田、祀社稷、祷求雨、下劝农令的仪式和措施，“重农轻商”、“重本抑末”成为理所当然的“理国之道”。中国农民大都束缚在土地上，“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很少流动。受此影响，中国俗文化乃至中国文化形成了一系列颇具农业社会特色的传统特征，如：君权至高无上的“东方专制主义”渗透进人民大众的几乎一切活动中；“安居乐业”成为民众理想的生活态势；另外，崇尚中庸，少走极端；推崇诚实可靠，注重自然节奏；着眼于现世和人事，不太关心来世和人事以外的自然界；注意切实领会，鄙弃口辩，等等。其中尤值一提的是以“耕读传家”为理想的治家模式，在我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代代不息，形成中国家庭模式中独特的风貌，并由此衍生出中国俗文化的

一系列内涵和特征。

家国一体的宗法社会 中国古代史的发展脉络，不是以奴隶制的国家取代由氏族血缘纽带联系起来的宗法社会，而是由家族走向国家，以血缘纽带维系奴隶制度，形成一种“家国一体”的格局。因此，氏族社会的解体在我国完成的很不充分，因而氏族社会的宗法制度及其意识形态的残余大量积淀下来。不仅如此，由于自然经济在中国的长期延续，“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村社，构成中国社会的基础，而村社中所包含的宗族与乡党两大环节，为宗法制度，宗法思想的迁延、流衍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中国的奴隶社会是宗法奴隶制，封建社会是宗法封建制。由此决定了中国俗文化不可避免地涂上厚厚一层宗法色彩，蒙上父家长制政体的影子。如：对血缘关系的高度注重，对祖先的顶礼膜拜，对传统的极端尊重，等等同属此类。

民族性格 “民族性格即每一民族在历史发展中形成的一种心理状态，即各自的性格、情操、爱好等心理特点。具体表现在民族文化艺术、生活中，是物质生活条件与历史发展特点的反映。”中国人的民族性格也毫不例外地反映到中国俗文化中，形成特定的文化内涵。中国的民族性格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课题，从先秦时期对“华夷之辨”的反复讨论，到二十世纪初邹容等人力主革除“奴隶之根性”，梁启超倡导“新民说”，乃至几年前的“根除民族劣根性”的呼喊，均可视为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严复于1895年指出：“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